

余英時回憶錄(三) ——中正大學和燕京大學

• 余英時

一 入讀東北中正大學

我是在1946年夏天從桐城重回安慶的，然後到南京轉北平，最後定居瀋陽。當時抗日戰爭勝利才一年，絕大多數人都以為可以過幾年太平日子，但不到三年，中國便經歷了一場天翻地覆的鉅變。

我父親協中公和杜聿明是多年老友，勝利後杜奉派去東北負責軍事，力邀我父親同去，主要是為他籌辦一所大學，即1946年成立的東北中正大學。大學聘請了張忠紱為校長，專業是中華民國外交史，在南開大學時曾和我父親共事，後來任北京大學政治系主任，抗戰開始即參加政府的外交工作。但他不久便奉派到聯合國工作，變成了一位掛名校長，因此我父親以文學院長代理校務。

我此時已十六歲，只讀過兩年左右私塾，上過安徽臨時中學一兩年，而且都是半途而廢，沒有從頭到尾讀完一學年。以程度而言，我大概只在初中二三年級之間：英文單字認得極少，一篇兩三頁的短文便有八十多個生字；數學、物理、化學則所知更少。但我的年齡已到了考大學的階段，所以我一方面在中正大學先修班（相當於高中三年級）上課，一方面找老師課外補習，希望在一年之後可以考取大學。

關於補習，我至今還記得兩位先生的講課。第一位是教數、理、化的劉老師，東北人，也是先修班教師。他教得很有條理，代數、三角、幾何，在三四個月之內便讓我得到了一個大概的認識；物理、化學也稍稍打下了根基。這些當然都是急就章，我也是以應付未來考試的心情而臨時抱佛腳的。劉老師不久便移居台灣了，從此失去聯繫，可惜我連他的大名也忘記了。

第二位補習老師是教我《史記》的沈伯龍。他授課的時間不長，前後好像只講了〈項羽本紀〉和〈陳涉世家〉兩篇。但我至今還記得他講鴻門宴的一幕甚

為生動，又解釋「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一句是當時口語，也說得入情入理。我最初以為司馬談父子寫的都是精心構思的典雅之文，經他點破之後，我才注意到經史中頗有直書俗語的地方，文言白話之間的界限竟不易劃分。幾十年後我寫過〈說鴻門宴的座次〉一文（余英時：〈說鴻門宴的座次〉，載沈志佳編：《史學、史家與時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70-77），大概種根於沈先生的講授。但不久之後，我才輾轉聽說，他原來是一度頗為著名的沈啟無，大概在抗戰時期曾與日本或傀儡政權有關係，因此改名藏身關外。沈啟無的名字今天已很少人知道，但在二十世紀30、40年代卻在文壇上極為活躍，他曾與俞平伯、江紹原、廢名並稱「苦雨齋（周作人）四大弟子」。他在1932年出版的《近代散文抄》，所選的文章以晚明公安、竟陵派的小品為主，周作人的序對他的取捨眼光甚為讚許。據當時人的評論，他的文章學周作人而得其神似。但他後來得罪了周而被逐出師門。周作人晚年寫《知堂回想錄》，在〈元旦的刺客〉一節中提到沈也在場，好像還受了點傷。這些故事當然都是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的，但當時聽說沈是周作人弟子，且為文學名家，我已經感到十分意外了。

那時和沈啟無背景相似的文人學士，流寓瀋陽的尚大有人在。我特別想提一下燕京大學法學院長陳其田。他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突襲後曾與燕大其他重要領袖如趙紫宸、陸志韋、張東蓀、趙承信等同時被日軍逮捕，拘押半年之後，判處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參見鄧之誠：〈南冠紀事〉，載鄧瑞整理：《鄧之誠日記》，第八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但他最後終與日方妥協，因此抗戰勝利後不得不遠走關外。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正在我父親所辦的「東北政治經濟研究所」擔任研究工作，顯得很萎靡不振，不知底細者決猜不到他當年在燕大是多麼飛揚跋扈。他在1937年所寫的《山西票莊考略》一書，至今尚不失參考價值。但他任法學院長時期則權勢炙熱，令人側目。1932年5月，蕭公權應約準時到院長室談話，他竟讓蕭在外面鵠候半小時以上才予以接見，而且說話極不客氣，其架子之大可以想見（參見蕭公權：《問學諫往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頁99）。

我在先修班一年，以補習數、理、化為主，但還記得國文老師王森然先生教得很生動，他同時也是一位畫家，在瀋陽開過畫展。天下事無巧不成書，1970年代末，我的北京親戚託人帶了一幅畫贈給我，說這位老畫家在北京很有名，並且是他們的鄰居。我打開一看，赫然是王先生的作品。這大概只能說是緣分了，可惜後來我沒有機會去拜訪他。

1947年夏天，我考進了中正大學歷史系，這大概是因為當時東北學生在偽滿時期受教育，多不能適應中華民國的考試題目，所以我也居然在錄取名額之內。我選擇歷史為專業，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的數、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受了父親的影響。我父親在燕大已專攻西洋史，後來在哈佛大學則追隨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研究美國史，回國後在南開也教西洋史和美國史。我家所藏英文書籍也以西史為主，我雖不能閱讀，但耳濡目染，

便起了讀西史的強烈願望。我的課外閱讀則由梁啟超、胡適的作品開始，種下了愛好中國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學一年級的中國通史由一位青年講師講授，教材是錢穆《國史大綱》，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錢先生的學術著作。因此，我在這所新辦的大學雖然僅僅讀了三個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卻大致決定了。

中正大學雖在遍布戰火的關外，第一年居然也聘請到了幾位名教授，不過有的是以訪問的身份應聘而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梁實秋，他在北大任教，我父親特別以厚酬請他到瀋陽教一個半月。我已知道他是魯迅的論敵，也看過他寫的《罵人的藝術》。我父親在家中設宴接待他，我因此有侍坐的機會。他的幽默或俏皮話往往引起哄堂大笑，而他自己則仍然保持着一副冷面孔。遇到這種情形，聽者無不感到這是極大的精神享受。另一位受尊重的是孫國華教授，他是行為派心理學名家，曾任清華大學心理系主任多年。1920年代末他曾在東北大學教過書，很喜歡瀋陽的環境，這時適逢清華休假，所以全家前來。

最後我要介紹一下高亨(晉生)，他是東北人，又與我父親有私交，因此接受了國文系主任的職位。他出身清華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啟超、王國維，在國學界頗受尊敬，雖然當時尚無藉藉之名。高先生是一位剛正的有道之士，我沒有跟他讀過書，不過在他面前我自然而然地從內心發出一種敬意。他為人非常嚴肅，不苟言笑，偶然問我一兩句話，我只恭恭敬敬地作答，不敢放肆。有一次特殊的經驗則使我對他更加欽敬。1947年夏天，我考中正大學入學試，恰好他是監考人。不知道我是否有甚麼動作引起了他的疑心，他忽然走到我的座前，掀起我的試卷，察看下面有無挾帶之類。幸好我無任何作弊情事，否則一定被他趕出考場。他並不考慮我是朋友的孩子，真正做到了執法如山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後期，他忽然特受推重，許多新發現的文書(如馬王堆《老子》)往往由他註釋。但我對他的人格從無半點懷疑，他必然是為當時某種道德說教所折服，因此甘心以所學為「革命」服務。後來我讀到《吳宓日記續編》，發現他1950年代初在重慶時仍然沒有任何趨時的迹象，我更相信我的判斷是正確的。不過在瀋陽時，我作夢也不會想到他在1970年代會扮演以學術為政治服務的角色。

國共在東北爭鋒的情勢到了1947年夏天已發生重大的變化。這一年5、6月間共軍全力攻四平街，國軍則在軍長陳明仁的指揮下死守不退，終於在6月底將共軍擊潰。當時報上登出陳軍長囚首垢面的慘狀，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這是一場雙方死傷慘重之戰，也是國軍在東北最後一次勝仗。7月以後已是共軍反守為攻的局面。到了年底，瀋陽已處於被包圍的狀態。

我在12月中從瀋陽飛回北平時經歷了一次死裏逃生的驚險。當時機場一共有三架飛機，我父親被安排在第一架，我則在第三架。我正在排隊登機的時刻，父親忽然招手要我過去，因為第一架機還有一個空位。於是在最後一剎那坐上第一架，結果第三架失事了。

二 北平閒居

從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我在北平閒居。1948年春季，我不可能轉入任何大學，秋季曾考取了輔仁大學一年級，但北平又已在共軍包圍之中，我父親既決定南下上海，我便從未進輔仁的大門。不過這一年對我而言，還是有特別的意義，我開始接觸當時中國流行的思潮了。

在中正大學時，由於東北籍同學對蘇聯軍隊的暴行深惡痛絕，左傾的風氣沒有機會發展。學生偶有遊行示威，大都是針對蘇軍而發，如抗議他們殺害中國工程師張莘夫事件。但是一到北平，思想空氣完全不同，逼得我不能不面對當時意識形態的衝突。

我讀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便在這一時期。這是一本宣傳辯證唯物論的通俗講話，用最淺近的常識誘導青少年入彀，從宇宙觀到人生觀，全書構成一封閉系統。書中常引「卡爾」、「伊里奇」的話，我初見簡直不知所云，再讀下去便慢慢發現原來是馬克思和列寧的名字——Karl和Ilich，為逃避檢查而改。當然「艾思奇」三個字也是「愛（馬克）思（伊里）奇」的意思。《大眾哲學》當時流傳很廣，在青少年讀者中有相當影響。它雖沒有把我變成一個信仰者，卻對我發生了一種刺激作用，即書中觸及了一些我過去沒有注意的問題。這是我接觸馬列思想之始，所以特別提及。

當時對我的思想影響最大的要算儲安平辦的《觀察》周刊以及結集而成的《觀察叢書》，這當然是因為我的心靈深處接受了五四運動以來的現代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人權等等。我記得1948年夏天讀到胡適在《獨立時論》上的〈自由主義是甚麼？〉一文，非常興奮，因為胡適在文中強調爭取自由在中國有很長的光輝歷史；他指出孔子「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說法，我也認為很有說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國既是一個古老的文明大國，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經過調整之後，可以與普世價值合流，帶動現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種極端的觀點，即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中只有專制、不平等、壓迫等等負面的東西。

《觀察》是我每期必讀的刊物。它的基本立場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因此採取了多元開放的編輯方針，各種不同甚至衝突的論點都兼收並蓄。對於像我這樣剛剛開始思索政治、經濟、社會等大問題的青年人，恰好是一種實際的思想訓練。我必須不斷地作出自己的獨立判斷，至於正或誤則是另外的問題。當時又值暴力革命或和平革新爭持不下的局面，我受了胡適的影響，偏向和平革新，所以我對於費孝通《鄉土中國》和《鄉土重建》兩本書特別欣賞；他和吳晗合編的《皇權與紳權》也提出了我感興趣的歷史問題。費孝通留學英國，略知英國近代史上紳士階層（gentry）怎樣由封建地主轉變為企業家的過程，他的《鄉土重建》便是想用英國模式來為中國地主謀求一條和平演進的出路。由於他在鄉村（即江村）作過實地調查，所描述的地主生活狀態大致很客觀，這是他的作品當時對我有特殊吸引力的根本原因。但暴力革命終於來臨，他關於鄉土中國的一切分析和討論也都成為廢話了。

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到耶魯大學訪問，費孝通是團員之一，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他。我當面告訴他，早年曾讀過他的論著，他遵守官方規定，趕快聲明：那些錯誤的東西不值得再提了。我忍不住說：如果先生不曾寫過那些東西，今天也不會到這裏來了。他只好尷尬地一笑。平心而論，到1948年為止，費孝通是中國極少數最有代表性的社會學家之一，他的英文論著也受到國際同行的重視。1955年秋季，我在哈佛旁聽巴森思(Talcott Parsons)的「社會系統」一課，涉及中國方面的參考書便有費孝通和張之毅合著的《鄉土中國：雲南農村經濟研究》(*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和他在《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發表的關於中國紳士(China Gentry)的論文(編者註：參見Hsiao-Tung Fei, "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no. 1 [1946]: 1-17)。可惜進入1950年代以後，他的學術生命便劃下了休止符。晚年在中國出版的英文著作《走向人民人類學》(*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實在令人無法卒讀，偶然在中文雜誌發表的隨筆之類也光彩無存，遠不能與《觀察》、《大公報》時代相比，這是令人惋惜的。

最後我還要提一下《新路》周刊。這份刊物是由錢昌照出錢辦的，他是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獲取經費毫無問題。他留學英國時受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影響，傾向於民主社會主義。這份刊物是1948年夏天在北平創辦的，清華社會學教授吳景超任主編，發表的論文也較多；在經濟學方面，清華劉大中和北大蔣碩傑最為踴躍撰文。1970年代以後，我在美國與台北常有和劉、蔣見面的機會，偶爾還追憶過《新路》的往事。1975年夏天，劉大中已接受了香港新亞書院董事會的聘約，繼我之後出任院長。不幸他回美國康乃爾大學之後發現癌症已到了晚期，這年10月他和夫人雙雙自殺，是當時一大新聞。我從《新路》中吸收了不少關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社會平等之類的知識，擴大了我的眼界。1950年代初，我在香港寫《民主革命論》、《自由與平等之間》等書，雖都膚淺不足觀，但思想的根源必須上溯至1948年在北平的閒居生活。

我在北平時期當然並不是整天都在嚴肅地關心思想問題。作為一個文化古城，北平確實有說不盡的生活情趣，我偶然會到郊外頤和園、玉泉山、香山等地遠足。至今不能忘懷的樂趣之一便是逛舊書店，琉璃廠固不必說，隆福寺、東安市場以及其他小書攤都是令人流連忘返的所在，有時發現想找的舊書而又索價甚賤，可以使人高興好幾天。夜晚聽免費京劇也是一大樂事。北平戲院上演京劇往往在晚上7、8點鐘開場，門道精的朋友告訴我：如果你過了10點去闖戲院，那時門口已無人收票，便可大搖大擺直入，且可能佔到好座位。我曾有好幾次看白戲的經驗，如譚富英的《定軍山》之類(壓軸戲一定排在最後面)。這是舊北平最令人戀戀不捨的文化生活。1978年10月，我在離開了二十九年之後重到易名的北京，竟感覺到那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在北平時期，我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次學生示威遊行，也沒有加入讀書會組織，但是偶然遇到我感興趣的演講，則一定去聽。例如楊振聲在北大講魯迅先生的舊體詩，我便聽得津津有味。這也是我在北平和在校大學生接觸的機會，使我可以感受他們的思想脈搏。我可以負責地說，當時青年對國民黨的貪污無能普遍地不滿意，但除了地下黨員外，很少學生認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所信奉的主要還是「五四」以來的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之類的普世價值，何況當時中共也是打着「新民主主義」的旗號，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是在打下南京、上海以後才發表的（1949年6月30日）。知識青年和民主黨派人士反對國民黨的另一重大理由即是它的「一黨專政」，他們之所以要推翻國民党政權，決不可能是希望找一個有效的「一黨專政」來代替一個無效的「一黨專政」。儲安平在〈中國的政局〉中的名言：「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已把這種心理表達得十分清楚。推翻一個政權並不足惜，但是天翻地覆的結果竟斷送了民國以來緩緩出現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雛型，則是當時知識階層完全沒有想到的。

三 上海行

我們在1948年10月下旬離平赴滬時，北方的形勢已在共軍的控制之下。胡適10月22日從南京飛回北平，在日記中寫道：「此次出外三十六日，真有滄桑之感。局勢一壞至此！」（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367。）我父親便是在這一情況下決定暫遷上海的。這時火車早已不通，飛機又不能多攜行李，所以我們改從天津乘船，這是我第一次航海之行。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說，我在上海的九個多月是相當沉悶的。和在北平時不同，我人地生疏，又不會說上海話，簡直沒有活動的餘地。但這幾個月恰好是中國天翻地覆的關鍵時刻，我是在上海目擊國民黨崩潰及共軍入城的。現在就記憶所及，略說當時大勢。

我們到上海不久，淮海之戰便結束了，國民黨的現代化精銳部隊在這一戰役中幾乎損失殆盡，接着便是和談的呼聲復起。從1949年1月蔣介石退位，李宗仁以代總統的身份與中共重開談判，到4月中和談破裂，中國大致處於停戰狀態。當時一般人自然盼望和平能夠實現，但深知兩黨歷史和「專政」本質的人，對和談並不抱任何希望。2月4日，傅斯年給李宗仁的信說：「共產黨本為戰爭黨，以往尚如彼好戰，今日走上風，實無法與之獲得和平。」（傅斯年：〈致李宗仁書〉，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2495。）他因此斷定：一、中共只與地方談和，徹底消滅中央政權；二、絕對走蘇聯路線；三、必盡量摧毀以往掌兵符的人以及知識界領袖。他的預言事後證明是很準確的。

戰爭雖然暫停，但一般人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狀況仍急速地惡化。我在上海碰到了兩種非常特別的生活體驗，至今稍一回想，好像剛剛發生的事情。

第一是通貨膨脹。那時金圓券貶值一日數十次，因此上海居民手中只要有紙幣便立時到黑市去買銀元。民間流通的銀元有兩種，一為袁世凱像，叫「袁大頭」；一為孫中山像，叫「孫小頭」。黑市錢販子個個把手中的銀元盤弄得鏘然有聲，口中則翻來覆去嚷着八個字：「大頭小頭，買進賣出！」我每天早上從家中拿着一兩個銀元到黑市去換紙幣，然後飛跑到菜場去買當天所需的食物，因為跑得慢了，手中紙幣便會降值不少。年歲已久，我的記憶已模糊，彷彿一個燒餅的價格便可以高到多少萬元。這是經濟崩潰的明確症狀。

第二是黑社會的猖獗。由於內戰關係，城鄉之間的交通常在混亂狀態中，影響物資運輸，以致城市居民的日常必需品供不應求。黑社會組織便趁機而起，搶先霸佔市場，將一切物資控制在手，然後以高價轉賣給消費大眾。這些黑社會份子當時在上海到處活躍，人稱「黃牛黨」，很多市民戲稱它是國共以外的第三大黨。舉一個我親歷的經驗為例，在上海看電影，電影院售票所是絕對買不到票的，因為所有的票都早被黃牛黨買光了。我每次買票都只有向電影院前人數眾多的黃牛黨手上去轉購，票價比電影院正式規定的要高好幾倍。這更說明市場和一般社會生活都已失序了。當時上海警察局的人似乎也和黑社會打成一片，已沒維持秩序的能力。

僅僅從上述的兩個現象看，國民黨的統治無法持續下去，已是很明顯的了。

和談破裂，共軍4月21日渡江，很快攻破南京。一個月之後，同樣的命運落在上海的身上。用中共的說法，我是在上海「被解放」的。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既不恐懼，也無興奮，把政權易手看作是平常的事。蕭公權記他在離開上海前聽人說：「共產黨要來哉？嚙底怕頭！」（蕭公權：《問學諫往錄》，頁204。）我可以為他這句話的真實性作證。這大概便是中國歷史上所謂「民心已失」的狀態。淮海戰役後，殷海光為《中央日報》寫社論，大聲疾呼：「趕快收拾人心！」，然而已經來不及了。

但是中共拿下上海兩個月左右，控制漸漸由鬆而緊，我父親已開始聽到新政權有探問他的迹象，這是因為他在東北與杜聿明的一段關係。情勢陡然變得十分緊張，他必須趕快離開上海。在和談的幾個月中，我父親也曾多次和朋友及親戚討論去台灣或香港的可能性。但是當時傳聞，香港生活水平極高，我們住不起；台灣更是人地生疏，而且安全也無保證。避難的事便這樣拖延下來了。現在形勢逼人，不得不走，卻只剩了一條險途，即坐船到舟山群島，再轉台灣。這是險途，因為不僅海上風浪難測，而且常有海盜出沒。由於時間緊迫，我父親攜母親與幼弟匆匆登程，我是唯一能代我父親結束上海寓所的人——頂來的房子必須頂出，收回頂費，書籍和不少雜物也要裝箱運回北平。我身為長子，義不容辭。到楊樹浦碼頭送他們上船的一幕，真如生離死別，所以至今不忘。

他們是6月初離開的，我在月底便參加了燕京大學在上海的招生考試，僥倖考取了二年級插班生，一個多月後乘火車回到北平。

四 燕京見聞

我家在北平有一所住宅，坐落在交道口北兵馬司十七號。平時有不少親族家人共居，是很熱鬧的。我回北平後當然先回自己家中，和親族重聚。但燕京大學遠在西郊，必須住校，因此我平時在燕大，周末則進城家居。最初乘三輪車往返，後來騎自行車，就更方便了。

我離開北平九個多月，回來後發現氣氛完全改變了。此時，北平建都已成定局，中共和民主黨派的重要人員都集中於此，一方面等待封官，一方面爭取住宅。「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杜甫這兩句詩恰好可以借來描寫當時的北平。不久分官已定，北平城裏到處流傳着下面這個「順口溜」（當時尚無此詞）：「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這一股怨氣當然是從老革命幹部胸中吐出來的。其實這是為了應付「統戰」需要而採取的暫時策略，將不少高級職位分配給國民黨降官、降將及其他黨外人士。但黨內幹部紛紛不平，提出嚴重抗議，逼得黨組織派出大批人員去做說服工作。我的表兄項子明還私下告訴我，毛澤東在黨內講話時曾用過一種說法：毛說，排斥黨外人士加入政府是所謂「關門主義」，三國時關羽便是一位典型的「關門主義者」，他不肯聯合孫吳以共同抗曹，終於失了荊州，敗走麥城。這個說法很巧妙，所以我至今未忘。但這正是《詩經》所謂「巧言如簧」和《論語》所謂「巧言令色」。一黨專政是不可能長期開門的，不過數年，「關門主義」終於取得徹底的勝利。

上面是關於權力世界的事，下面再說兩個一般社會上的小故事。第一是從城裏去燕大的路上，我和三輪車夫閒聊，不經意中我說了一句：「你們現在翻身了。」不料這句話引起他滿腹牢騷，他說：「翻身！我今兒是從牀上翻到了地上。」原來那時百業蕭條，三輪車的乘客也不多，難怪他對「翻身」兩字的反應竟這樣強烈。第二是表姐汪志華（項子明的二姐）在銀行當小職員，有一天下班回家（北兵馬司住宅），又哭又氣。大家問她遇到甚麼不如意事？她說，今天銀行失了一筆為數不小的錢，黨委書記要對所有工作人員進行搜身，但黨員和團員一律免而不搜。他的理由很簡單：入了黨和團的人都已經過了重重考驗，他們的品德完美已有可靠的保證。未入黨團者叫做「群眾」（此詞沿用至今），無論在政治上或道德上都低於黨團員一等到二等（黨員高團員一等，自不必說）。顧頤剛在上海也受盡了幹部的盛氣凌人，因此稱他們「自居於征服者而迫人為被征服者」（顧頤剛：《顧頤剛日記》，第七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253）。可見當時無論南北都是「道一風同」。這些都是小事，但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極深，所以五六十年都未忘卻。

後來我有機會讀到顧頡剛、鄧之誠所寫的日記，與我的記憶大體吻合。總之，北平的老百姓和上海一樣，對國民黨已全無信心，但對共產黨也抱着疑慮。為勝利而興高采烈的是革命者及其同路人，並不是一般老百姓。這是我親眼目睹的實情。

我非常喜歡燕大，不僅因為它是我父親的母校，而且校園之幽雅在中國是數一數二的。我被分配在第二食堂中的一間宿舍，與另一新生同住。這座房子緊接着未名湖，我閒時即在湖畔徘徊或靜坐，冬天湖面結冰後，我還在夜間跟着其他同學去湖上學溜冰。所以1978年11月隨美國科學院所派的「漢代研究考察團」訪問「北京大學」時，因恰好經過未名湖，我曾脫隊去第二食堂匆匆一轉，不勝今昔之感。

燕大是美國教會出錢創辦的，創辦人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在戰後出任駐華大使前，一直是校務的實際負責人。我到燕大報到時，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一文剛剛發表不久，學校的處境似乎很窘迫，但我們這些新生並未感到任何不安。我進燕大時，它已沒有絲毫外國的教會作風，相反，中國的政治氣氛卻異常濃烈。從前大學師生最厭惡的是校內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兩種組織，因此1949年以前，民主自由派的人一直要求黨團退出校園。不料此時的燕大除了專業課程表面上仍由各學系安排外，其餘一切課外活動都在黨團的控制之下，例如錢俊瑞、艾思奇等前來演講，或對有問題的人進行「鬥爭」之類，一切功課都停止，以便師生全體參加。

五 燕大學人

1949年是燕京大學末日的開始，再過三年，它便不存在了。我已在另處寫過燕京末日(余英時：〈回憶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學——巫寧坤先生《孤琴》序〉，載巫寧坤：《孤琴》[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3-27)，這裏不想重複，只想介紹一下燕大的幾位教授，以及我在燕大所受到的衝擊。

我最早認識的是聶崇歧先生，那一年以前，我們全家去遊頤和園，準備在那裏過夜。因為我父親和他是同學，我們特別繞路到燕大去拜候他，並向他借了一些被單和毯子。但是事隔一年，他已不記得我了，經過自我介紹，他才弄清楚我是故人之子。聶是山東人，苦學出身，專精宋史和歷代官制。後來我在哈佛聽太老師洪煨蓮(業)先生說，哈佛燕京學社的引得編纂，聶先生的貢獻最大。洪先生還特別稱讚他的人品，1948年秋季聶先生到哈佛訪問一學年，但因北平局勢緊張，他顧念長兄一家，於12月便匆匆趕回。洪先生說他「孝友無雙」。他在哈佛期間，楊聯陞老師正在任教，楊先生註釋利瑪竇中國遊記中的明代官制名稱，得到聶先生的幫助不少。這些官制的民間通稱以西文拼音寫出，極難辨識。若非如聶先生那樣對明制和掌故爛熟於

胸，根本便無法還原。所以，楊先生後來在英文本《中國史講題綱要》(*Topics in Chinese History*)中特別向他致謝。

1949年秋季，聶先生沒有開宋史課程，他開的是必修課「中國近代史」，始自鴉片戰爭，用的教科書則是署名「武波」(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最近邵東方先生還在斯坦福大學圖書館中找到此書，並將封面影印給我看)。我最初還以為聶先生是應付當時需要，勉強講授此課。最近讀《鄧之誠日記》，才知道聶先生早在1949年2月15日已表示要教這門新課，可見完全出於主動。鄧還譏笑他「可謂發憤維新」(《鄧之誠日記》，第五冊)。依我現在的推測，他大概已認清「中國近代史」一課將愈來愈重要，與其讓史學修養不夠的人把它變成一個政治課程，不如由他承擔起這個任務，仍能保持學術的水準。我的推測是有根據的，因為他講授時雖不背教科書的基本線索，但對某些細節似乎另外下過功夫，深入原始史料，並提出重要的客觀事實。我至今依稀還記得的是關於曾國藩打太平天國的部分。他當然也譴責曾國藩，但卻講了許多曾怎樣起來組織地方武裝和最初一再失敗，有一次幾乎自殺的經過。他說得源源本本，顯然讀了不少資料，有些是教科書上所沒有的。他也沒有用當時流行的「漢奸」、「劊子手」這類激情口號。

除了「中國近代史」外，我又選了一門「歷史哲學」，講的是史學理論與方法，由翁獨健先生講授。他是燕大歷史系的高材生，畢業後到哈佛研究蒙古文和元史，獲得博士學位。他頗愛好語言，回國後又學了滿文，當時則在自修俄文。

在這門歷史哲學的課中，他指定普列漢諾夫(Georgi V. Plekhanov)的《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中譯本為教材，但他說自己正在努力讀俄文原本。我當時已聽說過普氏和這部著作在俄國馬克思主義史上的重要性，普氏在政治上雖反對列寧，但列寧還是承認普氏此書教育了整整一代的俄國讀者。這部著作追溯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來源，除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霍爾巴哈[Paul T. d'Holbach]等)、日耳曼哲學(黑格爾[Georg W. F. Hegel]的歷史必然性)、烏托邦社會主義外，普氏還特別強調法國史學家基佐(François Guizot)、迭利(Augustin Thierry)、米尼(François-Auguste Mignet)等的貢獻：他們把歷史進程解釋為各種社會階級為不同的物質利益而鬥爭，這對於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說有鋪路之功。但普氏認為馬克思不僅充分吸收了以上種種思想資源，而且掃除了其中一切缺點，從此奠定了社會科學的基礎，因此他把馬克思比之為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和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普氏此書和翁先生的講解確實為我開闢了一個新的思想世界，而且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特別是關於法國史學家的部分。必須承認，我當時的理解是相當模糊的，不過興趣確是很濃。以後我常常研讀歐洲近代思想史，其根源在此。

翁先生在班上又介紹了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西方哲學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英文本給我們讀，他說羅書有兩點長處：第一，書名《西方哲學史》是一種謙遜的表示，不取西方中心論的傲慢立場；第二，羅氏說明他同時注意哲學和社會、政治背景之間的關聯，這也是此書的一個特色。大致說來，這門課並沒有把我變成歷史唯物論者或一元論者，但我以後研究思

想史並不專重抽象觀念，而往往尋求觀念背後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複雜因素，也許是從這門課程中得到的啟發。期終以論文代考試，我所寫的〈墨學衰微考〉便是從戰國到秦漢間的社會變動着眼。

學期還沒有結束，翁先生已被任命為北京市文教局長，這多少有點出乎意外。他問班上同學，有誰願意隨他去文教局服務？好像沒有人積極回應。我說「意外」，是因為他在班上從不流露出任何政治傾向，也從無一句政治宣傳的話，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和共產黨在政治上竟已達到如此互信的地步。我讀《鄧之誠日記》才發現他厭惡國民黨，同情左傾知識人與學生，由來已久。但他似有一套明哲保身的本領，在國民黨時代未引起注意，後來在共產黨下面當官，也終能全身而退，沒有遭到特殊的劫難。他是我離開燕大後唯一重會過的老師。1986年秋季，他在美國訪問，他的女兒和女婿從波士頓開車繞道耶魯，在我家中盤桓了一個下午。他這時對現實政治的態度是相當消沉的。他告訴我最近剛剛入黨，為的是老年生活可以得到不少方便。

我選的第三門課程是「大二英文」，由西語系趙蘿蕙教授主講。我在巫寧坤先生《一滴淚》和《孤琴》兩書的序中已分別寫了不少關於趙老師和她的先生陳夢家的遭遇，這裏便不多談了。我只想補充一點，趙老師是用英文授課的，也要求學生在課堂上說和寫英文。這對於我而言則是破天荒第一次，開始時很不適應。不過一個多月後我的英文口語、閱讀和寫作都有明顯的進步，雖然離通順之境尚遠。在這一學期，我的英文真正打下了一點基礎，所以至今感念不忘。

我的第四門課是「歐洲史導讀」，主持的老師是一位女講師（或助教，已記不清），這是一對一的指導，相當於西方的“tutorial”。我因讀《鄧之誠日記》才發現了她的大名——李文瑾。她為人極和善，引導我讀書很有耐心。因為我是插班新生，她在導讀之餘也告訴我不少關於學校和歷史系的故事。翦伯贊編輯庚子義和團史料，竟列清初記錄書畫的《庚子銷夏記》為參考書，便是她告訴我的。又據她說，燕大當時有所謂「四大真空管」，翦即其中之一。「真空」指學問空疏而言。

關於翦伯贊，我在《鄧之誠日記》中發現了不少材料，順便再說幾句。早在1949年2月12日，歷史系主任齊思和便告訴鄧，「本校社會系聘定翦伯贊任教，歷史系從此多事矣」。1950年4月19日，齊又來和鄧談，說「翦伯贊非安分之流，宜加戒備」（《鄧之誠日記》，第五冊）。可見歷史系舊人對翦疑忌之深，齊思和似乎知道翦來燕大必有政治背景。1952年6月30日，鄧在日記中記他的姨太太（名半雲）予翦以「臭蟲」的綽號，因為翦「眉眼擠在一處」，像臭蟲（《鄧之誠日記》，第六冊）。此後日記中即常用「臭蟲」一詞，我最初讀之不解，最後找到了起源的一條日記，才恍然大悟。

翦伯贊在文革時夫婦雙雙自殺，結局很悲慘，這裏談到他決不忍再涵責備之意。我是要指出：他打進燕大並非個人行動，而是代表黨來收拾所謂「資產階級史學家」的。而這些「資產階級史學家」也不全是呆子，他們早有所覺。《鄧之誠日記》的史料價值便在這裏，細讀這部日記，我們才能懂得翦在反右

運動中所說的那些兇霸霸的話，例如「我們一進北京，資產階級的教授們就準備了一個鴻門宴來迎接我們」（參見翦伯贊：〈歷史科學戰線上兩條路線的鬥爭〉，載《歷史問題論叢》，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頁32）。

既然交代了《鄧之誠日記》的史料作用，也應該對鄧本人稍作說明。鄧之誠（1887-1960）原籍江蘇江寧，但生於成都，十一歲以後又旅居昆明十八年。他早年參加過反滿的革命活動，後又反對袁世凱帝制，因此和陳宦（二庵）建立了很深的關係，其日記記載與二庵在北平往來的事跡極多。從政治背景說，他自始便反對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對南京國民政府敵意甚濃。在學術思想上，他鄙視胡適及其倡導的新文化運動。定居北平後，先後在北大、北平師範大學等校任教，1930年起則一直在燕大歷史系講授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明清史等課程。他雖然對共產黨既不了解也不擁護，但在國民黨敗勢明朗化時，則在日記中時時流露出快意恩仇的情緒。他可以說是一位文化保守派的老學人，而沒有國民黨或自由主義者的「反共」意識。因此，他的日記反而保存了許多客觀事實。

我在燕大時只見過鄧之誠一兩次。《鄧之誠日記》1949年12月19日記「晚歷史系新生十餘人來吃水角（餃子）」（《鄧之誠日記》，第五冊），其中便有我在。又因為他的兒子鄧珂和我同年插班二年級，而我們兩人又同好圍棋，偶爾也有到鄧府下棋，因此與老先生多見過一面，也未可知。不過無論如何，我不記得和他交談過。他好罵人是出了名的，我對他敬中不免有畏，這是不必諱言的。

六 「入團」經過

最後我要談一談我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經過。我從來沒有參加政治組織的意願。我父親曾在閒談中提及他戰時雖在考試院任參事之職，卻一再婉謝加入國民黨的邀請，這一態度對我發生了無形的影響。我從上海回到北平後，和項子明相見時竟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了一種距離感，大概潛意識驅使我避開趨炎附勢的嫌疑。在新政權下入黨或入團，更是我作夢也沒有想到過的事，因此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開國大典，我也沒有去湊熱鬧。但是出人意外，大約在11月尾，歷史系的團組織開始積極地發展我「入團」。最初一兩次，我都以「不夠資格」為理由婉言辭謝。不料他們緊追不捨，攻勢一次比一次更猛。他們的說辭是很能打動年輕人的心的，例如：入團對於個人不但沒有任何實際利益，而且要求個人作出更大的犧牲；團員在組織中，由於得到群體的幫助，更能發揮個體的能力等等。

後來經過自我分析，我認為有兩個主要因素使我最後同意申請入團。一是我性格上的大弱點，往往因為顧全情面，不能斬釘截鐵地對別人的要求一口回絕。我總覺得人家是一片好心，應該極力避免讓人下不了台。這便留下了餘隙，使對方永遠覺得有機可乘。二是虛榮心，我並未以「入黨」或「入團」

為榮，但是看到團組織如此爭取我，認定我有很高的「為人民服務」的潛力，一種自我陶醉的心理不免在潛滋暗長。我記得被說動之後，一連幾天曾在宿舍的走廊上來回走動，低頭苦想，相識的同學都看出我有滿腹心思。其實這是內心在進行當時所謂的「思想鬥爭」；用中國傳統的話說，則是「天人交戰」，不過何方為「天」、何方為「人」，卻很難分辨罷了。

我同意申請入團之後，大規模的調查便開始了。這又是我完全沒有料到的事，因為我以為組織已對我有了充足的認識才發展我入團，而組織方面事先也未提過申請入團的複雜程序。調查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個別地向認識我的老師與同學調查我在言與行兩方面有甚麼缺點；二是在個別調查結束之後，團組織召開一次全系師生大會，我必須出席聽取大家的質詢和評論，並一一當面回答和澄清。我已記不清此會的專門名稱，當時只感覺這是專門針對我一個人的批判會。幸好我在燕大的時間很短，沒有太多的毛病落在大家的眼裏，最嚴重的批判也不過是說我有點知識上的傲慢而已。所以，我輕鬆地過了這一關。大概兩三個月之後，我才在香港收到通知，申請已獲准，等我回校後正式辦理入團手續。

我在燕京時期既未正式入團，自然遠沒有機會仗組織之勢以欺凌群眾。但是在申請入團的時期，我在精神上發生了一次變異（這是事後自我分析所得到的認識，當時並不自覺）。這一變異表現在兩個相關的方面：一是感染了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另一則是「左傾幼稚病」。這兩種精神變態互相支援，有時一觸即發，造成個人的罪過。

這裏我要講一個從來沒有對人說過的故事。1949年12月下旬，有一位安徽同鄉到北兵馬司住宅來訪我的一位堂兄，適家中沒有別人，我接待了他。他是一位基督教牧師，在安徽蕪湖傳教，那裏也有不少余氏宗親。他告訴我安徽的近況，主要是地方幹部怎樣殺人逼錢的殘酷行為，以及窮人生活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更為困難等等。他的話還沒有講完，我的左傾幼稚病和狂熱症已同時發作了。於是我聲色俱厲地駁斥他的事實陳述，所持的理由大致不出剛剛撿來的宣傳八股。他猝不及防，滿臉錯愕，狼狽而去。但我當時如飲狂泉，完全無法自制，不但失去理性，而且人性也已歪曲得所剩無幾。大概十幾天後，我去香港，在上海親戚家中住了兩三天，聽到南方的情況比那位牧師所說的更為可怕。我雖然還勉強為之辯護，然而心中已後悔不應該對那位牧師如此粗暴無禮了。時間愈久，我的愧悔之感也愈益加深。六十年了，我每一思及此事便覺得無地自容。如果說這件事對我起過甚麼教訓作用，那便是讓我認識到人心中深藏着種種邪惡，一旦釋放出來，整個人一定會被吞蝕掉。也由於有此體驗，我才對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現象」有比較深刻的理解。

全文完